

# 程泰宁:建构中国建筑自身的话语体系



是建构自己话语体系的时候了  
——文化自觉引领建筑创新——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中国建筑的现状似乎与这一发展进程不大匹配。“千城一面”和缺乏“中国特色”的公众评价、国外媒体很多不无嘲讽意味的报道,突显了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应该看到,在建筑创作中,没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和自己的哲学、美学思考,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近百年以来,中国现代建筑一直处于西方建筑文化的强势影响之下。从好处说,西方现代建筑的引入,推动了中国建筑的发展;从负面来讲,我们的建筑理念一直为西方所裹挟,在跨文化对话中“失语”,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虽然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不少学者、建筑师,以至政府官员,在反思的基础上,尝试过民族形式、中国风格等等,但由于缺乏有力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只是以形式语言反形式语言,以民粹主义反外来文化,其结果,只能停留在表面上无疾而终。最后,仍然只能在西方语境中挣扎。

近年来,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新中式、坡屋顶等中国元素又火起来

了。但是如果自身话语体系的建构不能跟上,其结果只能和过去一样随风而逝。因此,建构以自己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为基础的理论体系,以支撑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

如何建构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我同意法国阿兰·李比雄这样的观点:“中国文化更新希望就在于深入理解西方思想的来龙去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自己。”据此,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些西方现代建筑的哲学和美学背景。“语言是存在之家”“文本之外无他物”,特别是近二十年“数字语言”出现,似乎更加确立了语言哲学在西方的统领地位。

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西方当代建筑是不是一定程度上也是“语言”的天下?耳熟能详的类型、建构、模式语言、空间句法,以至最新的数字语言、非线性语言等,事实上,这些建筑语言都可以看作是西方语言哲学的滥觞。通过学术交流,这些“语言”也已经成了很多中国建筑师在创作中最常用的词语。

应该看到,“语言”包含着语义,特别是它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建筑创作机制进行了理性的分析解读,其方法值得借鉴,这对我们高校的教学工作确有一定帮助。但是应该看到,由于这些“语言”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人们的心理和情感,忽视了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的深层次联系,无法完整而深刻的解释和反映建筑创作实际,因而这些“语言”常常是在流行一段

时间以后光环尽失,在创作实践中并未起到“圣经”的作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语言”为本身,极易走入偏重“外象”的形式主义的歧路。我们已经明显地看到,从二十世纪后半期,以“语言”为本体的哲学认知与后工业社会文明相结合,西方文化出现了一种从追求本原,逐步转向追求图像化、奇观化的倾向。

对中国建筑师来说,我们在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是否需要思考这种以“语言”为哲学本体,注重外在形式,强调视觉刺激的西方建筑理念也有其局限?我们能否走出“语言”,在建筑理论的创新上另辟蹊径?

近百年以来,中国一直希望摆脱西方建筑“语言”,对中国哲学、美学体系进行研究探索,从王国维开始,许多学者提出把“意境”纳入独立美学范畴,去构建具有东方色彩的体系。

近年来,李泽厚先生以“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为主旨,提出以“情本体”取代西方“语言”为本体的哲学命题,这些哲学和美学思考,是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深入比较和研究的成果。尽管由于建筑的双重性,我们不能把建筑与文艺等同起来,但毫无疑问,这一系列研究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建筑理论以支撑建筑创新有着重要的启迪。

正是从这些研究出发,结合中国建筑创作的现状和发展,我考虑,相对于西方以分析为基础、以“语言”为哲学本体的理论体系,我们可否建构以“语言”为手段、以“意境”为美学特征、以“境界”为哲学本体,这一具有东方智慧的建筑理念,作为我们建筑创作上求变创新的哲学和美学支撑?我认为这是一种可能。至少这一相对系统的建筑理念,使我在创作中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并在创作中获得充分的自由。

长时间以来,我深深意识到,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语言哲学对于我们建筑创

清华大学 张利:  
对于建筑创新,我认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量式,在熟悉的基础上增加强度,还有一种是结构性的,而文明的进展往往是结构性创新。

从程泰宁先生的作品中,我读到他对本地区文化有着巨大的热情,他的许多作品是在最成熟的年代创造出来,作品诞生后便成为这一片区的标志。作品中有着特有的场域、文化建造传统,与民族传统、现代舒适性结合在一起,这依赖于创作者超人的艺术创作能力、技巧、积淀,也更依赖于其对本地文化的理解。

在其作品中,有着令人惊奇和沉吟的片刻,我理解是,中国建筑师因为理解、热爱这个环境而把自己的一家之言真正解释、融入到建筑中,这时我们体会的不仅仅是民族建筑,而是世界史的话题。艺术创作本身实际上揭示了我们自己对所处文化、环境、建筑的理解,这种个性化的诠释最真实。

东南大学 张彤:  
程泰宁先生在杭州有一系列作品,黄龙饭店、杭州城站、浙江美术馆等,这些作品本身奠定了杭州建筑语言和格调。我想把程泰宁先生的创作语言比拟中国绘画的笔墨。笔墨在世界绘画中是很独特的存在,既是工具,又是手段,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手段和目的的统一。

中国画从最基本的标准到最高的标准都离不开笔墨。对于笔墨的理解,我认为形和神的统一。中国绘画中的笔墨有传统,有写意,有性情,有意味,程泰宁先生的笔墨力透纸背,超越目的和手段。或者说,兼通程泰宁先生说的另外两个层次,语言可以达到意境和境界。这是东方的审美体验,是融通性情、空间、材料、环境,是情境合一、交融式的体验。

程泰宁先生的建筑作品不是线性的、分析的创作方式,而是经纬交融的、整体性、网络式的思维方式,体现出程泰宁先生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也反映出他探求中国式的建筑创作哲学思想和实践的境界。

上海交通大学 阮昕:  
在程泰宁先生的作品中体现出一种信念,对生活的介入。形式可以千变万化,但信念有持续性、永恒性。

我认为,程泰宁先生提到中西建筑的观点特别重要。我在国外学习生活十八年,发现国外建筑领域存在许多误区。首先与国内对国外建筑20世纪以后的发展过于推崇,缺乏冷静的分析解读,而国外对国内建筑发展有些忽略和不理解。另一个误区是,西方国家特别是英语世界,对欧洲过分崇拜。程泰宁先生提到,中国要有自信,应该有自己的体系,与西方、世界上其他文化有一个平等的、心平气和的交流,我也非常赞同。

中国追求意境和哲理,西方则体现出对建筑纪念性和永久性的追求,而今天我们对建筑可持续性、绿色、低碳、节能的思维必须从技术上提高到意识形态上和伦理的层次上。

同济大学 卢永毅:  
程泰宁先生关注中国建筑发展状况,并进行批判性的观察思考,思考中国建筑文化如何重构,这种思考探索和坚持,体现在他大量的创作实践中。

通过对程泰宁先生的作品阅读,可以看到形式是其创作方面非常强烈的表达。程泰宁先生的作品以文化类建筑居多,有不少纪念性建筑。其实,纪念性建筑的设计非常困难,二十世纪以来,纪念性建筑经历了几个方面的挑战,比如抵抗抗回权威性的中心化,抵抗布景式、符号化表达,抵抗过度商业主义、抵抗复古怀旧方式唤起记忆,还有抵抗脱离地域的形式侵入。纪念性建筑也从民族、国家、身份的表达到地域性、多样性的表达转变,然而至今纪念性建筑仍然是一种诉求。在全球发展的语境下,程泰宁先生做出很出色的探索,他立足此地,回应环境特征,挖掘环境特征,把建筑植入场地,连接景观。

而程泰宁先生所讲的个体性,是对地域的解读,对传统文化的诠释,是个人和社会之间互相作用产生的,建筑师承担的任务就是用个人的方式去和社会对话,和历史对话,以个人的方式建立文化自觉,来为集体做出选择。(吴真平)

# 建筑名家解析程泰宁院士作品

## 五省共建“淮河朋友圈”

近日,淮河生态经济带省际联席会议在江苏淮安召开,来自苏、皖、鲁、豫、鄂五省及沿淮各市政府负责人共商沿淮发展大计。在水缘相亲的“淮河邻居”眼里,合作、联动、共赢,是民之所往,心之所向。

千里淮河,地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是我国重要的南北分界线。几千年来,这里肥美广袤的土地,给淮水儿女带来了富足;而后又因黄河夺淮与兵家必争,这里的人民饱受水患与战乱之苦,沿淮城市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互联互通薄弱。然而与长江经济带地域相连、水系相通,与国家骨干铁路与高速公路在此交汇的区位优势,较为完备的产业根基,让淮河经济带成为我国中东部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

淮安首倡的“淮河朋友圈”

时光回到2010年,淮安市首次提出了“构建淮河生态经济带”的设想:以淮河干流为先导区,建设淮河生态经济带,把淮河变成一条造福两岸人民经济与发展的黄金水道、产业大道和生态廊道。

作为“淮河朋友圈”的首推和最积极参与者,淮安将淮河生态经济带视为推进区域发展的重大契机。在谋划和实施过程中,淮安高度重视、全力以赴。9年前的设想渐渐落在生动的调研实践中。

2012年初,淮安市委委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承担“构建淮河生态经济带

先导区”课题研究。随着研究逐步深入,沿淮蚌埠、信阳、盐城、淮南等地相继加入。

2013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安徽淮南组织召开《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战略规划研究报告》课题成果研讨会,国家发改委、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交通部、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发改委,沿淮城市主要负责人及专家们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建设国家第三条出海黄金水道”“打造我国第四个经济增长极”“促进我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一串串基于生态优先、集约互动发展原则绘就的“美丽淮水”设想,就此拉开了谋划推动淮河生态经济带战略落地的序幕。

此后,从3省5市到3省20市1县,再到5省25市4县,越来越多的沿淮城市加入到推动淮河生态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队伍”中。

2018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一国家层面的引领无疑带来新的生机与机遇,使淮河上下游区域为之联动。

2019年4月29日,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五省在省际联席会议上,共同审议通过《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和《淮河生态经济带省际联席会议制度》,并签署《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省际协同



推进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依托省际协商合作机制与平台,“淮河朋友圈”高质量发展的轮廓与色彩愈加明晰。

做好“水文章”,挺起绿色脊梁

淮河流域是我国粮食主产区和能源原材料供应基地,但同时,淮河流域的环境问题也较为突出,长期存在在水资源承载能力与人口、耕地分布不相适应的问题。在《协议》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被放在了首要位置。淮河要发展,首先要挺起绿色发展的脊梁。

生态文明建设从何破题?淮河生态经济带选择了“水”。今后的淮河,将在

士保持林、农田林网和堤岸林为主的防护林体系。

对淮河流域来说,做好“水”的文章是底色,是灵魂;而在地跨五省的淮河沿岸护水用水,实施环境管控联动势在必行。规划中,五省将创新跨区域生态治理,加强海陆空污染防治联防联控机制和预警机制,统一规划、联合执法,协调推进上中下游水资源保护与污染防治工作,破解“九龙治水”的难题。

江苏淮畔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算好环境账,也要算好经济账。

会议中,与会嘉宾认为,淮河流域资源丰富,应抓住机遇,建立起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把淮河流域打造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之后的第四个增长极。

这份底气与谋略沉淀而深远:《规划》中,淮河生态经济带以千里淮河为东西通道,从东到西分别以淮安、蚌埠和信阳三座城市为中心城市形成“三核”空间开发格局。在充分尊重生态文明理念下,促进淮河流域上中下游要素集聚,尤其在现代化产业布局上,注重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现代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产业的引进和厚植,结合“四化”同步推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淮河流域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要想富,先修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淮河生态经济带规划牵头制定者郑新立认为,淮河可以成为长江和黄河之间,中国的“第三条出海黄金通道”。

在江苏省内,淮安作为淮河经济带城市的“带头人”,正积极实施“借港出海”战略。无论从城市北部、中部、南部经不同流域入海,宽广的渠道必将带来更高层次的开放,让淮安作为江苏重要交通枢纽,拉近面朝大海的距离,发挥更大的经济节点和辐射带动作用。

在淮河入海口的盐城,也正大力实施产业转型、沿海开放等发展战略。以面向东北亚、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的独特区位和地缘优势,着力创建沿海现代产业集聚区、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的发展,加快着高新技术产业密集,令盐城更具辐射淮河入海门户都市圈的实力与魅力。

打好合作牌,走好融合棋,走好绿色路。淮水流淌过一片峥嵘岁月,今天的联盟与联动更恰逢其时。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谁都希望抱团携手,谁都在尝试迎“机”而上,一条水蓝民富的美丽淮河,一个产业协调、惠及两岸百姓、人与环境友好相处的淮河生态经济带,正向我们款款走来。(魏薇)

## 《北京市长城文化带保护发展规划(2018年至2035年)》公布

近日,《北京市长城文化带保护发展规划(2018年至2035年)》公布。《规划》提出,北京市长城文化带总面积达到4929.29平方公里,分为核心区与辐射区;其空间布局被确定为“一线五片多点”;长城沿线664处/片保护性资源分布了2873处资源点。

《北京市长城文化带保护发展规划(2018年至2035年)》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长城文化带”专项规划,是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成果。

《规划》主要内容包括:资源构成、价值与现状、规划定位、原则与目标、规模与空间布局、保护长城遗产、修复长城生态、传承长城文化、增进民生福祉、保障措施与协同机制等九个部分。

长城文化带总面积约为117个东城区

北京的长城全长629公里,宛如一条巨龙,从城市西北部一路蜿蜒,穿过门头沟区、房山区、昌平区、怀柔区、密云区和平谷区,从城市东北拐出境外。相关文化资源如同散落的珍珠,密布在长城遗产周围。如果按年代划分,

北京市内长城基本是北齐长城和明长城遗存。

随着《规划》发布,长城不再只论长度,更是有了空间的范畴——北京市长城文化带总面积达到4929.29平方公里,大约等于117个东城区的面积。如此广袤的区域被细分为核心区与辐射区。其中,核心区为长城的保护范围和一类辐射控制地带,面积为2228.02平方公里;辐射区为除核心区外的其他区域,面积为2701.27平方公里。

《规划》还通过对现存问题的深入分析,将长城文化带的发展定位确定为首都文化传承与生态安全屏障,并将北京市长城文化带的规划措施归纳为保护长城遗产、修复长城生态、传承长城文化、增进民生福祉、健全管理机制等五个方面,为未来这一区域的工作推进与项目落地提供了明确思路。

明星段长城“冠名”5个核心组团片区

有了空间概念的长城,到底是什么形状的?《规划》描述:北京市长城文化带的空间布局确定为“一线五片多点”,是对北京北部山区空间布局的优化。“一线”,即长城线,是北京长城墙

体连续形成的遗存线,是保护工作实施的主要对象。

“五片”,即5个核心组团片区,作为疏解长城开放景区游客压力的集中展示区。

“多点”,即长城沿线卫城、所城等指挥中枢及关口、城堡、堡寨延续至今的村镇,是长城相关文化传承、发展的主要载体。

其中,5个核心组团片区从西向东分别是沿河城组团、居庸路组团、黄花路组团、古北口路组团和马兰路组团。每一片几乎都是被明星段长城“冠名”的。比如:古北口路组团有古北口主景区、金山岭景区和司马台景区;黄花路组团则是慕田峪主景区,搭配九眼楼景区和箭扣景区、响水湖景区等;居庸路组团,八达岭和居庸关主景区是绝对主角,还有石峡景区、上关景区等;马兰路组团,主要有红石门主景区、将军关景区、大溶洞景区和黄松峪景区等。

通过“一线五片多点”的整体空间结构划分,是为了改变发展模式单一、资源整合不力,经济效益至上、建设投资盲目的现状,有助于构建首都部长

城文化带的整体新格局。

长城文化带分布2873处资源点

一条长城,饱含的是中华情,蕴含的是丰富的文化和生态资源。《规划》按照资源与长城价值的关联程度,对664处/片保护性资源的2873处资源点进行价值主题分类,共分为长城遗产、相关文化和生态资源三类。其中相关文化又分为军防村镇文化、寺观庙宇文化、抗战红色文化、交通驿道文化、陵寝墓葬文化和历史文化景观。

根据《北京市长城文化带价值阐释体系图》,各类主题交错分布,并非简单割裂。举几个例子:真保镇马路口路长城包舍砖瓦窑等长城相关遗产、燕家台村民居等聚落遗产、通仙观碑刻等宗教遗产;昌镇喇叭岭长城和马刨泉北京长城包舍长峪村等聚落遗产、西山惨案纪念碑等红色文化遗产和白羊沟风景名胜区等自然遗产。

此举是在以往对长城资源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回答了什么是长城文化,其价值载体是什么,整体的价值是什么等关键问题。

《规划》对现存的文化与自然资源进

行梳理,对资源价值及现状进行评价,总结了北京市长城文化带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规划》确定了该市长城文化带的战略定位、发展原则和各阶段目标,明确了核心区和辐射区的保护发展要求。这份《规划》遵循文物保护与生态涵养并重原则,为北京市长城保护、传承提供重要遵循。

数读长城

我国各时代长城资源分布于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04个县(市、区)。

在2000多年的营造史中,先后历经了我国古代的春秋战国、秦、汉、唐、明等12个历史时期,现存长城文物本体包括长城墙体、壕堑/界壕、单体建筑、关堡、相关设施等各类遗存,总计43000余处(座/段)。其中,长城墙、壕堑遗存总长度2.1万公里,烽火台、敌台、马面、水关(门)、铺房、烽火台等单体建筑近30000座,关、堡等2200余座。

全国仅12.3%长城墙体保存较好

长城始终面临自然和人为作用,不断残损、消失,并形成今天以遗址为主的面貌。

长城资源调查认定和评估中,“保存现状较好”的长城人工墙体约占总数的12.3%，“保存现状一般”的约占18.1%，“保存现状较差”的约占18.4%，“保存现状差”的约占27.1%，“已消失”的约占24.1%（“保存现状差”和“已消失”共约占30.4%）。其中,明长城人工墙体中保存现状比例分别为8.2%、17.6%、23.9%、18.9%和31.3%。

北京市19年来投入4.7亿元修长城

自2000年至今,北京市财政投入约4.7亿元,开展长城保护工程96项。

未来三年,根据遗产保护的修缮理念和原则,该市还将开展箭扣东段和南段的修缮工程,2772米长城和17座敌台将得到有效“保养”加固。“救命式”的抢险将在未来五年不断及时启动。

同时,今年北京市范围内将开展长城抢险加固工程10项,并依据长城存在险情情况制定未来五年长城抢险工作计划。(岳崎)